

清·程瑤田 撰

程
瑤
田
全
集

壹

陳冠明等 校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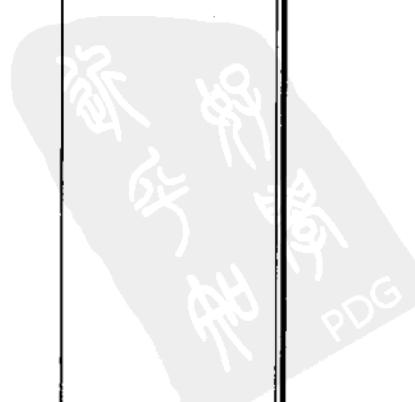


安徽古籍叢書

程瑤田全集

壹

黃山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程瑤田全集/(清)程瑤田撰;陳冠明等校點. - 合肥:
黃山書社,2008.12

(安徽古籍叢書第六輯/安徽古籍叢書編審委員會編纂)

ISBN 7-80707-482-5

I. 程… II. ①程… ②陳… III. 程瑤田(1725~1814)
- 全集 IV. Z424.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113994 號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
本書出版得到 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 資助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辦公室

程瑤田全集(全四冊)

(清)程瑤田 撰

陳冠明等 校點

*

責任編輯 李霜琴等

責任校對 李霜琴等 封面設計 國亮

黃山書社出版發行 合肥中德印刷培訓中心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67.5 插頁 6 字數 1254 千字 印數 2000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707-482-5

定價 179.00 圓

凡發現本書有印刷、裝訂錯誤，可直接向承印廠調換。

安徽古籍叢書編印緣起

我國歷史悠久，典籍豐富。我省地處南北之交，學術尤擅其盛。數千年來，哲學、史學、文學、藝術、語言、科技，作者輩出，著述如林，或自名一家，或蔚然成派，多為中華民族文化之菁華，有裨於社會主義文化之建設。允宜及時整理，以廣流傳。

自明清，以至近世，南北郡邑已有涇川叢書、龍眠叢書、貴池先哲遺書、南陵先哲遺書諸刻。一九三一年，復有安徽叢書之編刊，所收皆皖人著作，分期影印。出至第六期，以抗戰軍興而中止。盛業未竟，論者惜之。

今者，中央倡導整理古籍，我省領導對此尤為關心。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委員會幾經商討，決定編纂安徽古籍叢書。編纂宗旨是在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批判繼承，古為今用，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最其體例，約有數端：一、所收皆為歷代皖人著作，時間一般以辛亥革命之前為限，根據內容，分類成輯。注意稿本、稀見本之搜輯與傳布。二、整理方式包括輯、校、標點和注釋、今譯。校勘，力求採用善本為底本，校以他書，或加補輯、編次。標點，採用新式標點。注釋，務求精確，但不作煩瑣考證。整理中，盡量吸收國內外研究的新成果。三、鑒於古籍之特點，所出各書多用繁體字；且版皆豎排，以期一律。四、凡熱心於本叢書編印及捐貲助刊者，得於書內題名。

安徽古籍叢書編審委員會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修訂



程瑤田畫像

述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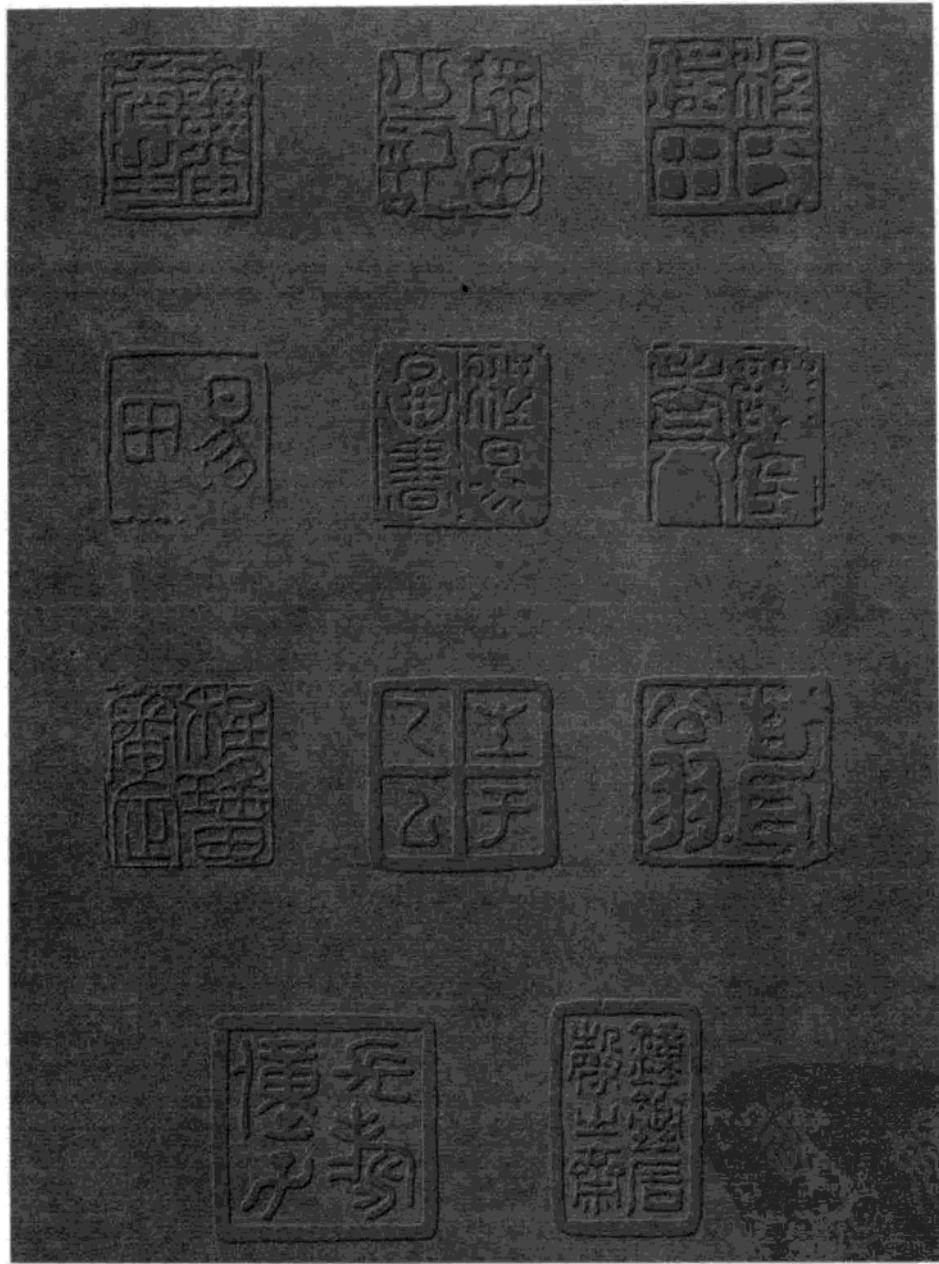
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天德王道一以貫之，辨繫在此二句。己對人言極而言之，天下皆人故也。又對天下言也，爲仁之實在己之動容周旋中禮而已。故視聽言動己也，苟其非禮則隨在皆有害於吾之爲仁，復禮者去其非禮而一一皆有以中乎禮，是禮也。天秩有之所謂受天地之中以生，而具於吾心以爲吾之性。聖人因其性中天秋之所有者制爲禮，以待其人而行能行其禮。斯之謂爲仁。自帝王至於黎庶無貴賤一也。仁主於愛，而與忍相反。故言仁政則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

後學程瑤田謹白

山舟先生閣下拜別後至都一病大熱
十餘日今兩月有餘雖已痊可然乏力
尚弱猶不能出門臨書不勝遙企之至

程瑤田頓首

程瑤田手蹟



程瑞田印鑑

卷之三
PDG

參加本書整理出版的人員

(按姓氏筆劃排列)

校點	王佐	伍巍	余國慶	周吟芬	陳玉璟	陳冠明
審訂	孫愫婷	曹寶麟	張尚穩	張紫文	諸偉奇	謝芳慶
責任編輯	余國慶	陳冠明	張紫文	諸偉奇	謝芳慶	陳玉璟
責任校對	李霜琴	班古	張增田	張守靜	張紅一	張曦仲
前期制圖	李媛	李霜琴	張增田	張守靜	張曦仲	賈東亮
責任印制	范蓓蕾	張守靜	張紅一	張曦仲	賈東亮	陳冠明
	王剛琪					

前 言

程瑤田（一七二五—一八一四），小名千兒，字易田，又字伯易、易疇。生而有文在手曰「田」，因名瑤田，字易田（民國歙縣志卷七人物志儒林）。世爲安徽徽州府歙縣人，家在邑城圭山塔下，荷花池邊（同上書，又卷一輿地志古跡）。補諸生。鄭虎文掌教紫陽書院，甚重之。九應鄉試，至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〇）恩科始中式。五十三年，大挑，得吏部選，爲嘉定縣儒學教諭。廉潔自持，以身率教。尋乞病歸，錢大昕、王鳴盛並作詩送之，推許備至。嘉慶元年（一七九六），詔開孝廉方正科，安徽巡撫以瑤田應，赴禮部會試，舉孝廉方正，賜六品頂帶。精通聲律，晚既失明，尚口授琴音記續編使其孫寫定。旁及詩歌、書法、篆刻等，無一不精（清史稿儒林傳二）。

程瑤田全集，全書一百一十萬字，包括程氏經學綜合性著作通藝錄及周禮劄記、蓮飲集等。通藝錄是全集主體，凡二十五種，五十五卷。就其成就而言，主要體現在義理、學術兩個方面，學術內容包括訓詁、象數、名物、制度、天文、地理、曆算、聲律、金石、書法、篆刻等。其對當代及後世影響，亦集中體現在此，而於學術影響尤爲巨大。

程氏學識淵通，「十三經傳疏貫穿於胸中」（湯文雋送易疇先生歸新安序）。所治之學皆能窮究精通，甚有名於當世。程氏與戴震同爲婺源江永弟子，與同時學者名人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汪中、王鳴盛、翁方綱、金榜、凌廷堪、紀昀、阮元、朱筠、任大椿、桂馥、陳壽祺、劉大櫆、丁杰等均有交誼，備受推崇。

重。交遊幾乎囊括乾嘉學派最重要學者。

程氏治學，無門戶之見，能集訓詁、義理、文章為一身。在《通藝錄》中，論學小記、論學外篇等，專論義理之學，是哲學著作；讀書求解、修辭餘鈔、讓堂亦政錄等，為其古文辭，即文章之學；蓮飲集濠上吟稿等為詩集；原有藤笈編非能編等，皆為時文，今不傳；九勢碎事為書法理論著作。除此之外，其他二十餘種皆為訓詁考據著作。全書以「通藝」為名，蓋亦以此。時人評其訓詁、義理之學「治經淹博似漢人，而說理醇密視宋儒或過之」（蕭掄送易疇先生歸歙浦序），十分準確。

壹

程瑤田為皖人，在乾嘉學派中屬於「正統派」之皖派，且應該屬於中堅。在儒家經典研究尤其是「三禮」研究方面，成就卓著，堪稱經學大師。然而，由於學界缺乏對《通藝錄》通體、全面研究，程氏之經學成就尚未引起學界足夠重視與肯定。

嘉慶年間，江藩撰《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經師經義目錄》，於程氏及其《通藝錄》似乎為盲點；假如不是盲點，則就是有意排摒。明顯跡象，蓋有五端：一，《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五為江永、金榜、戴震各立一傳，連篇累牘，洋洋灑灑。金榜、戴震均為江永弟子，程氏同為江永弟子，卻不為立傳，僅在戴震傳之後附載數語：「同時學者，郡人鄭牧、方矩、程瑤田、汪龍。鄭方二人事蹟不得其詳。瑤田字易田，又字易

疇，歙人。乾隆庚辰舉人，太倉州校官，著有《通藝錄》行於世。」將程氏與「事蹟不得其詳」之人並立。二，乾嘉時期，歙縣「漢學師承」而有成就者，程氏、金榜、洪榜、凌廷堪四人，程氏著述最富，而獨遺程氏。三，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七汪中傳：「於時流不輕許可，有盛名於世者必肆譏彈……然錢少詹事竹汀、程教授易疇、王觀察懷祖、孔檢討眾仲、劉訓導端臨、李進士孝臣諸君子，或以師事之，或以友事之，終身稱道弗衰焉。」所列諸君子即錢大昕、王念孫、孔廣森、劉端臨、李惇。除王念孫與程氏一樣，附於戴震傳，其他各人均獨立有傳。四，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六汪元亮傳謂：「平生論學，則推東原及程君易疇。」東原即戴震之字。同樣被推，一立傳，一附傳，已是不妥，而推者立傳，被推者反為附傳，尤為不平。五，程氏《通藝錄》二十餘種，於「三禮」多所發明，洵為鄭玄功臣，而其國朝經師經義目錄竟無一字提及。蓋江藩家中乏書，於《通藝錄》未嘗寓目，故不語、不詳如此。善夫袁枚有言：「考據之功，非書不可。子貧士也，勢不能購盡天下之書；偶有所得，遼東之豕，縱有一瓶之借，所謂販鼠賣蛙，難以成家者也」（小倉山房尺牘再答黃生）。

現代學者專門研究清代經學、乾嘉學派，對於程氏亦知之甚少。如，有一本《清代經學史通論》說：「皖派導源於江永，而成於戴震。程瑤田、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都是皖派的主要人物。」但其下介紹，唯獨程氏祇有五六行字，甚至未提到《通藝錄》。再有一本《清代考據學研究》，在提到汪中時說：「當時的考據學大家錢大昕、段玉裁、程瑤田、王念孫、劉台拱、孔廣森、李惇等，都極其稱讚他。」但該書並未對「考據學大家」程氏作介紹。另有一本乾嘉考據學研究，主要參考書目未列《通藝錄》。周予同先生為著名經

學史研究學者，其中國經學史講義中編第七章清學清理乾嘉學派吳派、皖派，唯獨不及程氏。張舜徽先生爲著名文獻學家，又精通經學，精通清代學術，所著鄭學叢著是鄭玄研究系列著作，其中鄭學傳述考歷述漢代鄭玄弟子到清代承傳鄭學之人，清代有二十人，有江永、金榜、戴震、段玉裁、凌廷堪、胡培翬等，同樣唯獨不及程氏。而程氏通藝錄於「三禮」，於鄭玄之貢獻，無疑要超過上述諸人。

林昌彝、章炳麟、梁啓超等獨具隻眼，對程氏作出充分肯定、高度評價，將其納入乾嘉學者精英乃至清代經學精英之中。林氏射鷹樓詩話卷十四說：

近代經學昌明，精於漢易者，胡朏明渭、惠松厓棟、江鄭堂藩、張皋文惠言、曾勉士釗也；精於宋易者，胡曉村煦、徐易甫子陵也；能辨二十九篇今文尚書者，閻百詩若璩、宋半塘鑑、段若膺玉裁也；精於詩毛傳、鄭箋者，臧玉林琳、陳見桃長源、戴東原震也；精於春秋三傳者，萬充宗斯大、惠半農士奇、洪君直亮吉、汪容甫中、焦理堂循也；精於「三禮」者，張蒿庵爾岐、盛百二龍里、萬季野斯同、江慎修永、沈冠文彤、程瑤田易疇、蔡敬齋德晉、金蕊中榜、凌仲子廷堪、褚擣升寅亮、任子田大椿、許周生宗彥、林鈍村一桂、萬虞臣世美、謝甸男震、陳恭甫壽祺先生也；精於爾雅者，余古農蕭客、郝蘭皋懿行也；精於訓詁之學者，王懷祖念孫、子伯申引之、桂未谷馥、阮芸臺元、江秋史德量、劉端臨台拱、王菉友筠、何子貞師紹基也；精於律呂之義者，錢學淵塘也；精於天文、曆算者，梅定九文鼎、陳泗源厚耀、李成裕惇、李尚之悅、孔興軒廣森、李申耆兆洛也；精於輿地之學者，顧景範祖禹、胡朏明渭、黃子鴻儀也；精於史學者，全紹衣祖望、邵二雲晉涵、錢竹汀大昕

也；精於校讎者，顧千里廣圻、金瑛園曰追、盧抱經文弨、孫淵如星衍也。

林氏爲經學家，陳壽祺弟子，精於「三禮」，著有《三禮通釋》二百八十卷，考證名物、度數，故對於當代經學成就瞭若指掌，一一道來，如數家珍，將「詩話」寫成「經學歷史」。章氏檢論卷四清儒明確提出清代經學各流派，其中有「皖南」一派。章氏說：

皖南始江永、戴震……震生休寧，受學婺源江永，治小學、禮經、算術、輿地，皆深通。其鄉里同學有金榜、程瑤田，後有凌廷堪、三胡。三胡者，匡衷、承珙、培翬也，皆善治禮。而瑤田兼通水地、聲律、工藝、穀食之學。震又教於京師，任大椿、盧文弨、孔廣森，皆從問學。弟子最知名者，金壇段玉裁、高郵王念孫。

梁氏清代學術概論是清代第一部學術史專著，稍後又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清代學術概論一書，其突出特點，一是精細，二是準確。此書二云：

其全盛運動之代表人物，則惠棟、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也，吾名之曰正統派……正統派之中堅，在皖與吳。開吳者惠，開皖者戴。惠棟受學於其父士奇，其弟子有江聲、余蕭客，而王鳴盛、錢大昕、汪中、劉台拱、江藩等皆汲其流。戴震受學於江永，亦事棟以先輩禮。震之在鄉里，衍其學者，有金榜、程瑤田、凌廷堪、三胡——匡衷、培翬、春喬——等。其教於京師，弟子之顯者，有任大椿、盧文弨、孔廣森、段玉裁、王念孫。念孫以授其子引之。玉裁、念孫、引之最能光大震學，世稱戴、段、二王焉。

程瑤田赫然在目，並被視為「正統派」中皖派之「中堅」。清代學術概論十四又云：

其餘為部分的研究之書，最著者則惠士奇之禮說，胡渭之禹貢錐指，惠棟之易漢學、古文尚書考、明堂大道錄，焦循之周易鄭氏義、荀氏九家義、易義別錄，陳壽祺之三家詩遺說考，江永之周禮疑義舉要，戴震之考工記圖，段玉裁之周禮儀禮漢讀考，張惠言之儀禮圖，凌廷堪之禮經釋例，金榜之禮箋，孔廣森之禮學卮言，武億之三禮義證，金鶚之求古錄禮說，黃以周之禮書通故，王引之之春秋名字解詁，侯康之穀梁禮證，江永之鄉黨圖考，王引之之經義述聞，陳壽祺之左海經辨，程瑤田之通藝錄，焦循之群經宮室圖等，其精粹者不下數百種。

……典章制度一科，在清代亦為絕學。其動機起於治「三禮」，後遂泛濫益廣。惠棟著明堂大道錄，對於古制度專考一事，泐成專書者始此。徐乾學編讀禮通考，秦蕙田編五禮通考，多出一時名人之手。其後則胡匡衷有儀禮釋官，戴震有考工記圖，沈彤有周官祿田考，王鳴盛有周禮軍賦說，洪頤煊有禮經宮室答問，任大椿有弁服釋例、深衣釋例，皆專注禮；而焦循有羣經宮室圖，程瑤田有通藝錄，貫通諸經焉。

通藝錄一書被推許為「清代絕學」。

清代學術成就，主要集中在乾隆、嘉慶年間。此一時期之學術成就，是中國學術史上之巔峰時期。在此之前，已經出現高峰。王引之詹事府少詹事錢先生神道碑銘總結清初以來經學成就之犖犖者，有顧炎武、梅文鼎、閻若璩、江永、惠棟。其中惠棟是承上啓下關鍵人物。程氏與戴震皆從江永學，與錢大

昕亦爲交遊好友。而程氏與二人皆善，在學術方面，淵源有自。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五戴震下附程氏、王念孫、王引之父子、段玉裁等，卷七汪中所列與汪中交遊者學界名流有「錢少詹事竹汀、程教授易疇、王觀察懷祖、孔檢討眾仲、劉訓導端臨、李進士孝臣」，諸名流即錢大昕、程氏、王念孫、孔廣森、劉台拱、李惇。可以看出程氏之經學成就與地位。

程氏之經學成就，體現在通藝錄中。通藝錄一書之學術成就，舉其大而著者，按現代學科分類，集中體現在語言學、考古學、生物學、數學、藝術等方面。而「通藝」之「藝」，指六藝、經藝，按傳統分類，屬於經學。

程氏治儒家經典，「貫通諸經」（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十四），幾乎遍及十三經、大戴禮記、說文解字、廣雅等，而尤以治「三禮」著稱。如考工創物小記、磬折古義、溝洫疆理小記及抄本周禮劄記等，所治爲周禮；儀禮喪服文足徵記、儀禮經注疑直等，所治爲儀禮；宗法小記所治爲禮記。故周中孚稱之爲「議禮之宗」（鄭堂讀書記卷五），李慈銘稱之爲「言禮之淵藪」（越縵堂日記同治癸亥正月二十日）；梁啓超說，程氏「篤嗜名物數制之學」；清代中葉「禮學重要著作」，「通藝錄最好」，是「精到的著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十二）。

二

清代學術不外三種途徑，即義理、訓詁、文章。戴震曰：「古今學問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於理義，或事於制數，或事於文章。事於文章，等而末者也。」並認爲：「漢儒得其制數，宋儒得其義理……三者

不相謀」（與方晞原書）。所謂「理義」，即義理，指宋明理學；「制數」，即指制度、象數等訓詁考據之學；「文章」，亦稱辭章，亦即文學，亦包括制藝或時文。「桐城文派」代表人姚鼐論古文有三端：義理、考證、文章，三者合一。姚氏說：「古文之學，須兼三者之用，然後為至」（復林君書）。又說：「鼐嘗謂天下學問之事，有義理、文章、考據之分，異趨而同為不可廢」（復秦小峴書，又見清儒學案卷八八）。名稱不同，實質不異，但姚氏不擅考據，虛晃一槍而已，其重點始終落實在所謂「古文」之上。晚清曾國藩力挺姚鼐，其歐陽生文集序說：「姚先生獨排眾議，以為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以義理為質，而後文辭有所附，考據有所歸。」而假如按照曾氏所說去做，則考據必然落空而無所歸。正因為如此，曾氏又加上「經濟之學」，說：「義理之學，詞章之學，經濟之學，考據之學。義理之學，即宋史所謂「道學」也，在孔門為德行之科；詞章之學，在孔門為言語之科；經濟之學，在孔門為政事之科；考據之學，即今世所謂「漢學」也，在孔門為文學之科」（求闕齋日記）。「經濟」為經世濟民，是權術，不是學術。

在此類理念支配之下，有清一代，特別是乾嘉時期，義理、考據、文章三者被視為互為衝突之途。尤其是義理、文章與訓詁之間，更是判若水火，冰炭不容。文章一派「桐城文派」中重要人物，對於乾嘉學派學者，幾乎無不如此。姚鼐說：「義理之學，有關於世道人心，不可誣也。顧學不博不足以述古，言無文不足以行遠。孤生俗儒，守其陋說，屏傳注不觀，固可厭薄；而矯之者，乃專以考訂名物象數為實學，於身心性命之說，則詆為空疏無據；其文章之士，又喜逞才氣，放蔑理法，以講學為迂，是皆不免於偏蔽。思所以正之，則必破除門戶」（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卷四三）。姚氏弟子方東樹攻擊漢學，專門著